

企业史研究的趋势与展望

——“中国企业史研究的未来”专题学术对话会综述

林立强 刘成虎

一

2020年9月26日，“中国企业史研究的未来”专题学术对话会召开。本次对话会由《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中国经济史评论》杂志社、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欠发达经济研究中心联合承办，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魏明孔、中国经济史学会秘书长隋福民主持。会议采用线上方式进行，除了会议邀请的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等领域从事企业史研究的15位专家学者以外，另有270余名学者与硕博研究生旁听了会议。

此次会议召开的缘由有二：其一，对近期中国企业史研究进行反思与总结，探讨企业史研究未来的出路。近几年来，中国企业史研究渐有回暖趋势，如魏明孔会长在开幕致辞所言：“中国企业史研究在经济史研究中最活跃，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涌现出了一批引领学术潮流的专家学者”。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企业史作为一个交叉、跨学科的研究领域，目前仍处于一个相对边缘的位置。在经济史、历史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研究中，很少有企业史学者参与这些学科主流的、重大的议题讨论，企业史研究的重大问题也很少得到这些学科主流的关注；很少有期刊组织企业史专题的讨论；企业史研究在方法、领域、结论、视野、研究范式上，与前辈学者相比，也少有重大突破。因此，很有必要对中国企业史研究的状况进行一次全面的回顾、总结，并展望企业史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其二，为弥补2020年第二届世界企业史大会(WCBH)不能如期召开之遗憾。2019年11月底，日本经营史学会(BHSJ)会长泽井实、日本经营史学会国际交流委员会委员长黑泽隆文来华参加“第二届中国企业史研究 Workshop”期间，他们作为第二届世界企业史大会筹备组主要成员，曾邀请中国企业史学者组团参加2020年9月10—12日在日本名古屋召开的大会，并为此专设中国分会场，但因为疫情，第二届世界企业史大会延至2021年。近年来，中国企业史学界在探讨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史研究话语体系的同时，也加强了中外企业史学科之间的学术交流，力图与国际企业史主流学术接轨，目前已经与国际上重要的企业史研究组织、机构与学者建立了密切联系，中国学者的研究领域、成果亦开始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

二

在中国，企业史研究是经济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因此，某种程度上企业史研究范式与经济史学研究范式的情况类似，即史学范式与经济学范式并存，这也是目前中国企业史研究的传统格局。从20世纪30年代出现如票号研究的成果以来，由于中国企业史学界老一辈学人“青灯黄卷”式的坚守，加之新一代学人不断开拓新的选题以及尝试新的研究方法，中国企业史研究有了长足进步。本次会议的九位报告人再次诠释了中国企业史研究的这一传统。

〔作者简介〕 林立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福州，350007，邮箱：254845415@qq.com。刘成虎，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副教授，太原，030006，邮箱：liuchenghu@163.com。

李培德(华中师范大学)在题为《为何研究中国企业史:近三十年的经历和体会》的报告中,以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企业史研究的发展历程为例,指出中国企业史研究在学科的独立性、研究方法、资料的收集和保存、学会推动研究成果等方面,与美日欧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他分享自己在银行史领域30年的研究经历,并对未来企业史学科的发展提出了具体的建议。龙登高(清华大学)的报告题目是《从本土到海外:华商的组织创新——东南亚华商合作的股权激励》,其主题聚焦华商的诚信问题,并从企业组织创新——诚信的制度保障层面展开论述。他通过对海外华商林氏集团、国内华为集团、振华重工等企业史多案例的分析研究,认为中国企业家群体绝大多数是以诚谋生的,诚信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内在驱动,诚信与合作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关于未来的企业史研究,他认为要从动态的、历史视野的角度切入,要对不同的企业家群体进行比较,要善于对各种资料来源做甄别与去伪存真的工作,并将挖掘与提炼出来的新问题上升到学术层面来思考。李玉(南京大学)《中国近代股权问题初探——公司史研究的一个侧面》的报告重点关注了公司的股权问题。他认为,以往近现代企业史研究焦点偏重于企业效益史、经营史、管理史、企业家史,关注企业的整体史乃至研究某一个行业长时段的表现。目前需要加强企业结构史、企业日常史、企业基层史、企业微观史、企业内部运作史的研究,而股权是企业内部史研究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兰日旭(中央财经大学)以《金融史视角的企业史研究》为题,认为研究企业史要特别注重企业的资金运作,并从企业组织形态、企业治理结构、企业经营管理特色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最后,他从史料、比较研究、方法论等方面谈了企业史研究的体会。

杨在军(河北经贸大学)的题为《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中的理论应用》的报告,中心内容是企业史研究者、特别是历史学背景的研究者十分关注的如何在企业史研究中运用理论的问题。他主要从理论应用的价值、理论应用的概况、理论应用的未来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并提出了如何在中国企业史学界加强理论运用的诸多建议。刘成虎(山西大学)的报告题为《传统中国的商业组织与企业史研究——以晋商研究为中心》,从企业史的角度对晋商研究目前的现状、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下一步可能出现的突破点进行论述,并提出了未来的晋商研究如何与企业史研究结合起来的一些思考,探讨了在晋商研究中运用新理论的具体设想,认为史料的突破与构建新的研究体系、理论体系将是晋商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赵晋(华东师范大学)、于之伟(辽宁社会科学院)、陈毅(同济大学)以《档案的发掘、整理、利用与企业史研究》为题,结合各人的研究实践,分别从私企、国企和在华外资企业三种类型的企业档案出发,重点论述了当代企业史研究如何发掘、整理、利用企业档案的内容与体会。此外,他们对如何加强改革开放之后的企业史的研究,如何打通近代、建国后、改革开放后这三个时段提出了具体的设想。

三

近年来,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政治学等领域不少学者开始关注企业史研究,这既为企业史的发展拓展了空间,但同时也对企业史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国内企业史学界开始认识到,为适应这种需求,拓展企业史的研究广度与深度,就必须引入历史学与经济学范式之外的多学科研究视角。本次会议的其他六位学者从各自的研究实践出发,围绕以上问题展开了对话。

周黎安(北京大学)以《关于我国企业组织史研究的思考》为题,他指出,现代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企业理论与企业组织史的研究密不可分的。他通过自己对中国和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所做的比较研究的例子,提出企业组织史的研究需要跟主流经济学、管理学形成一个比较好的对话,这种对话与碰撞,有可能引发新的企业理论或者组织理论。他特别强调了中国经验的重要性,因为中国有着更加丰富的文化背景,而且时至今日我们还有很多历史和传统在企业组织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宋磊(北京大学)在题为《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者期待的企业史研究》的报告中,

把自己比作一个企业史研究的“消费者”。他指出,就比较政治经济学而言,最为关注的是生产组织方式的比较、工业化进程的比较,以及国别比较的企业史,尤其注重产业史研究。他从自己与企业史研究结缘的亲身体会出发,他期待企业史研究能在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目标、读者方面兼顾特殊性和普遍性,既重视单个企业的独特性,也不忽视企业发展当中的普遍性问题,企业史就有可能帮助我们发现和突出当下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当中的典型事实。

林立强(福建师范大学)以《关于企业史研究与管理学关系的思考》为题,阐述了企业史与管理学合作研究的相关问题。他认为历史学方法可以对管理研究中的变量选择与评价、理论构建以及假设生成等做出突出贡献,尤其在管理学的“理论构建”与“理论检验”方面。他同时展望了企业史研究与管理学的合作前景,指出战略和组织是管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企业史在这两个领域开拓深度如何,将决定企业史与管理学合作的成败。中国企业史如果想在企业经营管理等微观领域有所突破,就必须与管理学紧密结合。林盼(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视野下的经济史研究》认为,1949—1978年这一时段的工厂在一定意义上能够满足“企业”的概念,可以纳入企业史研究的范畴。他以“单位制”的研究为例,说明了社会学研究方法在企业史研究中的运用。他也认同赵晋等学者,即打通企业史的三个时段,并对其进行一个纵向的比较,或许可以总结出一些富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的组织模式和生产模式。熊金武(中国政法大学)以《企业史中的企业家及其思想》为题,介绍了自己这些年企业家史研究的实践,他还特别分享了自己的一些调研经历,强调了企业家史研究中实地调研的重要性,指出可以强化口述史研究方法来弥补企业档案的不足,并可以在调研中加深对各类企业家群体的认识。

高超群(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以《企业史与中国经济史研究》为题。他首先对经济史中的企业史与企业的企业史进行了区分,认为企业史虽然是经济史的一个分支,但有其相对独立的学术属性。他提出应该鼓励企业的企业史研究,企业史研究和关注的核心对象应该是企业的组织形态、企业的行为选择等。接着,他指出了一些企业史中值得研究的新的学术领域,并从企业史的角度探讨了一些历史学、经济学中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他认为企业史的研究目标就是总结企业史的发展路径和演变逻辑,最终提炼出相应的理论。

在闭幕式上,《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主编魏众对此次会议做了总结性发言。他指出,中国企业史研究未来要取得大的发展,必须要做到“三有”,即“有趣”(企业史的科普化)、“有用”(企业与政府都感觉有实用性)、“有深度”(有比较好的分析框架、理论概括以及对企业规律的总结)。接着,他从六个方面,即企业史的宏观和微观视角;企业史研究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企业史如何具备多学科视野;企业史研究的内在和外在特点如何结合(既要捕捉一些外在的,显性的特征,又要把握其内在、隐性的特征);如何打通近现代三个阶段企业史研究的通道;企业史研究如何进行一系列横向和纵向的比较研究等,对中国的未来企业史研究的前景进行了展望。他认为如能解决上述问题,中国企业史研究前景将一片光明。

(责任编辑:高超群)